

全球對話——國際社會學通訊

國際社會學會

主編的話

第三期的全球對話擴大了版圖，因為有了巴西和日本兩組自願的生力軍加入，我們從原本的5種語言增加到7種！透過翻譯合作，全球對話建立了自己的國際年輕社會學者的社群。本期由訪談一位傑出的國際主義者——日本社會學會會長矢澤修次郎——作為開場。接著是副會長Margaret Abraham向大家報告2012年於Buenos Aires舉辦的ISA論壇，大會主題是「社會正義與民主化」。此次論壇已由拉美社會學會(ALAS)會長Alberto Bialakowsky、阿根廷社會學會(AAS)會長Alicia Palermo負責籌畫，研究協調委員會同意後通過。從拉美的社運觀點來看，在這裡舉辦是再適合不過的了(當然也可以辦在其他地方，像是最近的突尼西亞、埃及)；我們也繼續關注世界主義的辯論：Ulrich Beck回應Raewyn Connell、德國Helma Lutz對世界主義的反省、Sari Hanafi探討「多元普世主義」；此外也有來自中國、馬來西亞、澳洲、波蘭、哥倫比亞、聯合國的報導；Jennifer Platt撰寫了一篇ISA秘書處的歷史回顧，反映了社會學國際主義的下層建築之變遷；最後Jen Schradie則問道：我們日益依賴的資訊科技是否正把世界上某些社會學家排除在外呢？

本期內容

傑出的國際主義者	1
2012全球論壇	1
辯論	
Beck回應Connell	3
從世界主義到公共社會學	3
「多元普世主義」會議	8
全球	
中國：面對經濟發展	9
澳洲：何謂經典？	12
波蘭：「Scientific Circles」	12
馬來西亞：環境變遷	11
哥倫比亞：積極介入的社會學	14
聯合國：組織犯罪	10
反思	
歷史一隅	4
全球數位落差	13
社會學與社會運動	15

矢澤修次郎：傑出的國際主義者

矢澤修次郎是日本社會學會的會長，走遍世界各個角落，吸取各地社會學的養分，而這也正是他所強調之「多元普世主義(multi-versalism)」最佳體現。矢澤修次郎在日本教授社會學超過45年，出版過15本書、70餘篇文章，於1994到2002擔任ISA的執行委員。他長期以來推動在日本舉辦ISA的世界大會，而2014年此夢想也將實現。Michael Burawoy於2010年12月6日在日本橫濱的一間壽司餐廳訪問矢澤修次郎，訪談紀要如下：

• 矢澤修次郎教授，為什麼多年來你一直想在日本辦世界大會？

因為舉辦世界大會對於日本的社會學發展相當重要。今年我們自己所辦的社會學年會已經是第83屆了，所以我們的社會學擁有超過80年的歷史厚度；然而，這幾十年來我們卻沒有
(文接第2頁)

在Buenos Aires跳一首探戈舞曲

Margaret Abraham, Hofstra University, 研究副會長



讓我們前往Buenos Aires!

很榮幸可以在這裡跟大家宣布一個好消息：執行委員會將在阿根廷的Buenos Aires舉辦2012年ISA論壇(ISA Forum 2012) (8月1-4日)！執委會基於公開的原則，向

研究委員會(RCs)、工作團隊(WGs)、主題團隊(TGs)、國家學會(NAs)等ISA的組織發出招標訊息，期限是2010年11月15日。我們總計共收到了8件的計畫書，包括了阿根廷(Buenos Aires)，芬蘭(Helsinki)，法國(Paris)，墨西哥(Mexico City)，新加坡，土耳其(Istanbul)，英國(Birmingham)，烏拉圭(Montevideo)。經過謹慎的審查和投票後，阿根廷因

(文接第4頁)

(文接矢澤修次郎)

持續地與國外接觸和對話。我們當然引進了很多西方理論，可是這並沒有幫助我們自己釐清何謂日本的社會學。

例如，我為國際期刊撰寫了介紹日本社會學的文章，可是我找不到一個清楚定義本社會學主題的方式。所以到底什麼是日本的社會學呢？或許有很多不同的答案，可是日本的社會學家也不太清楚本質為何。當然我們引介了相當多的西方理論，而且日本的社會學家也都對於這些理論相當熟稔；此外日本也的確需要西方理論來解釋自身的社會。因此，我們必須要結合日本理論與西方理論兩者。這也是為什麼我想在這裡辦世界大會，就是要給日本社會學一個普遍化的方向。這不代表我的努力是一種單一現代性脈絡下的普世主義，而是多元普世主義的其中一種意義。

• 你如何解釋多元普世主義？

Multi-versality非我所獨創。這是Michael Kuhn和世界人文社會科學網(World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Network)所發展出來的，而恰巧也是在Buenos Aires舉辦的一個會議的主題(本期有報導)。而我是支持多元普世主義(multi-universalism)和在地普世主義(indigenous universalism)的。例如，當我們去參加東亞的社會學會議時，我們會發現韓國的社會學家傾向強調韓國社會的國族特性或是歷史傳統，中國也是。但是日本社會學家就比較著重在歐洲和美國的社會學，而非自己的傳統。受到韓國和中國的影響，我們嘗試要找到屬於自己的普世主義：一種結合西方或美國社會學和日本民族歷史的普世主義。

• 在日本有任何抗拒舉辦世界大會的聲音嗎？

不，並沒有。當然ISA詢問在日本舉辦的可能性已經好幾次，我記得從1960年開始已經有3次了，但每一次大多數人都覺得還沒準備好，尤其是沒有資金來源。所以錢是個問題；然而其他人也會問說辦這個會的好處是什麼？由於我們擁有一個很大的內需市場，學者可以賣自己的著作並且可以累積自己的名聲，即使沒有國際知名度也無妨；大家對於國際性的競爭沒什麼太大的興趣。當我提出要舉辦國際大會的時候，有些人怪我太崇洋了！我們在國際導向的社會學家和國內導向的社會學家之間有一條很明顯的界線，所以這也使得辦這次大會的一開始就得加倍地努力。

• 你一直都是國際主義者嗎？

是的。我1942年於銀座出生。雖然我很窮，可是有一間專賣外國商品的百貨公司就是我的遊樂場。每次我去那裡，我一定會跑到五樓去看體育用品，特別是從美國進口的棒球配備。我也常跑去圖書館，因為在家很難念得下書。而圖書館總分為成人區和兒童區，我年紀雖小，卻老愛往成人區跑，原因是我很愛看書。

• 能不能請你談談你的教育背景呢？

我是國中才開始學英文的。我爸有一間專門印英文書籍的印刷店，所以他英文很好，我也因此開始學習閱讀英文。高中時，那時是1960年左右，我變得很激進，參加了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的社運陣營。但是這個運動在我1962年進入東京大學的時候就沒了，而且整個學生運動也都幾乎銷聲匿跡。我們舉行了好幾次的示威，可是都沒什麼人來參加，連警察的人數都比我們少！

• 你在大學時念了社會學，而1962年日本的社會學是什麼樣子？

我想某種程度上那時候的社會學是帕深思結構功能論和馬克思主義的結合體。另外我們也讀韋伯、齊美爾、涂爾幹。結構功能論和馬克思主義很受主流學者的歡迎，因為這兩者都試圖解釋社會整

(文接第5頁)

編輯委員

主編：Michael Burawoy

執行編輯：Lola Busuttil、August Bagà、Genevieve Head-Gordon

副主編：Margaret Abraham、Tina Uys、Raquel Sosa、Jennifer Platt、Robert Van Krieken

編輯顧問：Izabela Barlinska、Louis Chauvel、Dilek Cindoglu、Tom Dwyer、Jan Fritz、Sari Hanafi、Jaime Jimenez、Habibul Khondker、Simon Mapadimeng、Ishwar Modi、Nikita Pokrovsky、Emma Porio、佐藤嘉倫、Vineeta Sinha、Benjamin Tejerina、伊慶春、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巴西：Gustavo Taniguti、Juliana Tonche、Pedro Mancini、Fabio Silva Tsunoda、Juliana Oliveira Carlos、Andreza Galli

日本：芝 真里、塩谷芳也、姫野宏輔、高見具広、速水奈名子、岩館豊、池田和弘

西班牙：Gisela Redondo

台灣：何經懋

新鮮的腎：世界主義理論回應南方社會學

Ulrich Beck, Ludwig-Maximilian University, Munich

全球對話才出刊沒多久似乎就陷入的一言堂的危險之中了。我的論點很簡單：我們並不處於一個世界主義的年代裡面，而是正在世界化(cosmopolitization)；Raewyn Connell則是質問道：我們可以不要再聽到這些北方的論述了嗎？

讓我先從說明「世界化不是什麼」開始。世界化並沒有如Raewyn Connell所說的「忽略了19世紀社會學中帶有啓蒙意涵的普世主義精神」，沒有「反映了那些少數特權階級的經驗，然後把自己所看到的就等同於是這個世界新的真實現象」，不是來自於高高在上的某處——歐洲的啓蒙理性；世界主義不企圖表面地宣稱「我們都彼此相互聯繫著」這樣的政治訊息，也不試圖把帝國主義和全球權力關係常態化。

世界化這個字代表什麼意思呢？為什麼將其與於源自於歐洲或以外的哲學和思想史之世界主義(Kant、Hegel、Habermas、Nussbaum、Appiah、Benhabib、Held等人)區分開來，是很重要的？世界化無關乎道德，而關乎事實。我想，用以下這個例子來解釋是再貼切不過的了：新鮮的腎臟。

醫學移植技術的成功(而非潛在危機)已讓相關的倫理議題退位，並為影子經濟打開了一扇大門，提供新鮮的人體器官給這個全球的市場(Nancy Scheper-Hughes)。在這個極度不平等的世界，我們從不用擔心腎臟的供貨量會短缺，因為總是有人願意割愛(賣腎、肝、肺、眼珠、甚至睪丸)。所有人都為了自己的生存而努力掙扎，因此，絕望的窮人和絕望的富人，其命運因此糾葛在一起。這正是所謂的「剝削的世界化」；那些被世界的政治經濟體系排除在外的的人——難民、無家可歸的人、在街頭流浪的小孩、非法工人、囚犯、年老的性工作者、走私香菸的人、小偷，等等，他們被一步步引誘走上賣器官這條路；無論在生理上，在經濟上，或是在道德上，販賣人體器官的現象「體現」在窮人與富人的身體中。

如今，現代性的基本倫理議題——身體主權，人類，生命或死亡的意義——在新自由主義與民主人權(選擇是無限的)的大旗之下被犧牲掉了，但卻沒人告訴我們這是怎麼一回事；這個過程，這是我們這個世界化時代的象徵。

(文接第7頁)

從世界主義到公共社會學 Helma Lutz,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世界主義是規範性的思想，源自於啟蒙時代；此外，世界主義也是一種倫理學的概念，探討關於正義，民主，人權的內涵。寬容，似乎是實踐世界主義的前提，然而仍有其模糊曖昧之處。寬容一方面要求相互肯認(例如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建立政治平等，可是另一方面又會成為權力、宰制、排他的工具手段(壓迫性的寬容)。於是，爭辯的軸線就變成：人們是否要包容所有的文化與族群差異(Joas)，以及到底什麼樣程度的寬容才合理(Forst)。如此一來，如果我們還是認為寬容是世界主義的前提，那麼還是同樣的問題：到底世界主義在特定的文化和族群脈絡下，意味著什麼？

若在民主國家的脈絡下，世界主義就不能是一種由上而下的菁英計畫，而必須是由下而上的。Stuart Hall探討的是後者，並且使用了「在地的世界主義」的概念。這概念從以下一個事實推導而來：日常生活中人們總是會遭遇不同文化的生活方式與交際互動。但是Hall也警告我們：文化不是一個被整齊切割、一致、獨立的綜合體或有機體，「我們的世界並不可以很清楚地被劃分成好幾個不同的文化群體」；我們必須要清楚知

道的反而是任何一個文化或認同都有其侷限性；易言



身陷政治風暴的Thilo Sarrazin

之，每一個人都不是任何單一的群體可以完整表述出來的。尤其在都市裡面，各種文化的相碰撞和互影響是生活的基本前提。同時，人們欣賞或接受不同文化的程度也不一樣。有些人強調或是著迷於那先看得見的差異(習慣、衣著、傳統)、認為是一種和自己固有生活模式

(文接第6頁)

(文接在Buenos Aires跳一首探戈舞曲)

其低廉的成本和免費的場地而出線。除此之外，其物價低廉，富有地理上的多元性(自從1982年在Mexico City舉辦大會後就沒有在南美辦過任何會議了)，加上它屬於ISA分類中的B類國家等等，都是我們選擇阿根廷的理由。在此，不但要恭喜拉美社會學會(ALAS)、阿根廷社會學會(AAS)及其他協辦的機構組織，更要謝謝ALAS的會長Alberto L. Bialakowsky和AAS的會長Alicia Itati Palermo遞出申請並提供場地。

讓我簡短為大家報告一下2012論壇的工作重點：

- 首先，最重要的目標是舉行各個研究委員會、工作團隊、主題團隊的聯合會議，結果將會反映在議程的組織上。籌畫者在規劃議程方面，在有限的時間下要盡可能保有彈性(議程大綱隨後提出)。

- 主題必須是對於社會有重大意義，要有公共的行動者，以及各地的社會學家都能有所貢獻的議題。這對於研究委員會、工作團隊、主題團隊來說是一個可以從公共行動者身上得到重要啟發的機會，也讓公共行動者能對論壇主題有所回饋。至於論壇主題已經交由研究協調委員會審議，近期就會公布。

- 舉辦暫時的研究工作會議，所有研究委員會的代表均須出席。

研究副會長和當地的籌備委員會共同負責學術議程的規劃。

我以研究副會長的身份為大家說明一下舉辦這次的論壇有什麼樣的優點：第一，我相信它不僅提供了讓不同研究委員會相互交流的機會和場合，也提供了彼此合作共事的契機。會後延伸的討論和對話也可以讓北方和南方的學者一起進行比較研究。

第二，在觀點和會員的參與上會更加多元，特別是對於那些代表人數較少的群體而言，我們透過選擇一個大家都負擔得起基本開銷的地點和創意地處理語言隔閡的問題，讓觀點和參與更具全面性。ISA作為國際社會學的主體，則要放更多的心思在以民族國家、地區、公民身份、族群、

(文接第6頁)

歷史一隅

Jennifer Platt, University of Sussex, 出版副會長

圖片說明：ISA秘書處成員(左到右)：Juan Lejarraga、Melanie Bloem、Izabela Barlinska、Jose Reguera。



我相信每一位會員都很習慣有在Madrid的Izabela Barlinska幫大家處理各種事務了吧。Izabela從1987年起就開始擔任ISA的秘書了，然而，這也是歷經一番長期人事與地點的變動之後才穩定下來的。秘書處的地點從早到晚分別是：Oslo, 挪威(1950-53)、London, 英國(1953-59)、Louvain, 比利時(1959-62)、Genève瑞士(1962-7)、Milano, 義大利(1967-74)、Montréal, 加拿大(1974-82)、Amsterdam, 荷蘭(1982-6)。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城市全部位於歐洲，而且都在以英語為官方語言(之一)的國家。法國雖然並不在上述國家之列，可是法語一直是ISA的官方語言，並且有三個法語國家曾經輪流過。秘書處所在之地皆是每一個國家的大都市，也由於競爭力與非常好的制度上之支持，每個地點都很適合與方便。建立一個永久的會址可以處理更多繁複、專業的ISA事務。

把場景拉回到現在，讓我用簡短的文字跟大家介紹一下ISA秘書處。Izabela Barlinska是波蘭人，她很早就參與ISA了。1978年在Uppsala的世界大會上她是學生研究員，隨後在1982年加入秘書處。當辦公室遷往Amsterdam後她成為了副執行秘書；然後在Madrid的時候成為執行秘書(並且這段期間她還獲得了政治學與社會學博士)。Izabela現在的同事有José Reguera(從1990年開始就負責資料庫與網站)；Juan Lejarraga(與Reguera一起工作並且負責帳務、收據、地址更新等等)；Melanie Bloem則剛加入工作團隊。之前的秘書處都是同時具有學術職位和兼任ISA的行政工作，所以都是2到3人的組織。其中幾屆的人都在社會學界享有盛名，例如1950年代的Stein Rokkan(1966-70年的會長)、Tom Bottomore(1974-78的會長)。雖然規章規定秘書處不能進入執行委員會，不過有些人還是在秘書處擔任要職。 ■

(文接矢澤修次郎，第2頁)

體。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對我們來說很重要，因為那個時候日本的共產黨相當有影響力。當然也有其他的像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等流派。那時候甚至已經有葛蘭西著作的日文翻譯。也因為如此當我再1973在St Louis的Washington University參加葛蘭西的第一屆國際研討會時，我變成了一位老師，去教那些不知道葛蘭西是誰的美國學生。



沈思中的矢澤修次郎

• 所以你拿到了社學博士？

很不幸地，那時候寫博士論文未成風氣，雖然後來大家都會補寫。到1980年晚期，大多數的社會學家都還只有寫過碩士論文而已。我則是鑽研社會學與實用主義，想知道美國帝國主義的特徵為何。你也知道，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大量引進了西方理論，以致於日本人在不知不覺中也成爲了帝國主義者。大家都誤會了西方理論，所以我決定把實用主義看成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一種形式。我主要研究William James和John Dewey，並將這兩者與Charles Sanders Peirce放在一起比較。於是在知名的日本帕深思權威Tominaga教授的指導下，我討論了結構功能論和實用主義的關係。

• 所以你深深地浸淫在美國社會學裡面？

噢，對！而我也再碩士畢業後到Washington

University進修了3年。因為我有拿到Fulbright獎學金，所以很自由自在地聽我想聽的課。另一方面我也想參加一些美國的社會運動。例如我就參加了一個抗議一間剝削勞工的酒廠的運動，還是工會運動的成員。我認爲若要深入瞭解社會的話，那就要研究社運。

• 你後來也和相當激進的Alvin Gouldner共事過？

是的。但問題是Gouldner雖然看似進步，可是他卻不參與社運。他激進的是理念。我有參加他的討論課，其中印象很深的是關於如何寫博士論文的。他以他自己的兩本書作爲例子：Wildcat Strike和Patterns of Industrial Bureaucracy。

• 你回到日本教書之後是怎麼實踐你的激進社會學的？

我那時候沒有什麼聽眾，而學生運動也沒落了。我雖然寫了很多書，很多文章，可是並沒有銜接理論與實踐。所以多數時間還是在校園內。我在津田塾大學教女學生，在一橋大學教研究生。他們其中很多人後來都在日本，甚至美國教書。

• 你仍然認爲你是激進主義者嗎？

噢是啊！我一向反對帝國主義，而且始終是個社會學家。

• 你依然覺得現在的美國和過去帝國主義時期一樣強大？

當然。帝國主義一直在變，從帝國主義變成帝國(笑)。美國霸權仍然屹立不搖。但美國也有好的一面，像是美國革命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具有人文主義代表性的事件。所以在這點上，我喜歡美國人民，可是並不喜歡主流的美國政治人物！我也不喜歡主流的社會學(笑)！

• 你認爲日本是帝國主義國家嗎？

某種意義上是。的確，如何超克日本的帝國主義的確是個重要的問題。二戰後我們其實有大好的機會去克服它，但很不幸以失敗收場。我們有的是一種沒有帝國的帝國主義，是在東亞的霸權。

(文接第7頁)

(文接在Buenos Aires 跳一首探戈舞曲，第2頁)

種族、階級、性別、語言等為基礎之權力或特權的來源上，因為這些因素都形塑了知識生產、資訊傳遞、研究擴散的面貌。這次在Buenos Aires的ISA論壇對於增進區域的多元和拓展社會學視野而言，是很重要的一步。

第三，可以提供年輕學者更多參與國際會議、和前輩交流合作的機會。這向來是一件重要的事，而且我希望2012年的論壇可以有一個特別的場次讓年輕人和前輩齊聚一堂。

第四，透過嚴謹的學術研究激發出在地、國家、跨國、全球的政策制訂和實踐，進步一連結社會學者和社運者，一起追求社會正義。我們這個時代需要社會學家抱持著堅定的信念投身於學術研究，一邊紮根在社會學，一邊從其他學科獲取靈感。解決諸如貧窮、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全球不平等、生態惡化、戰爭、民主倒退、危害人權等問題的挑戰和可能性，正式ISA可以發揮的議題，

並且可以進一步接合社會學和公共領域。如此一來，ISA論壇又再一次提供了絕佳的平台，讓社會學家可以進行全球性的對話和資訊交流，並且這些都將會帶來轉變。

選定落腳在Buenos Aires舉辦論壇是個好的開始，不過未來的一年半還有很多事情尚待我們去完成。藉這個機會也要感謝那些提出申請計畫書的國家願意為ISA開創新的可能；謝謝會長Michael Burawoy、研究協調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共同確保選擇過程的客觀與公正；特別謝謝Izabela Barlinska在徵求計畫這方面提供了文書和協調上的幫忙。這次論壇將有無限可能。論壇的成功不僅將有賴於在好的議程籌畫，也將奠定在這個國際社群中每一位學者、政策制訂者、運動者、公眾思索我們這個時代重要議題的努力之上。 ■

(文接新鮮的腎)

在被世界化的(cosmopolitanized)身體上，是來自那個大陸、種族、階級、國家、或宗教已經無關緊要。穆斯林的腎臟可以淨化基督教徒的血液；白人種族主義者可能需要黑人的肺才得以存活；金髮經理人的眼睛可能是來自於非洲街頭的某個小孩子；世俗億萬富翁的肝臟可能來自於巴西貧民窟的一位信仰新教的性工作者身上；有錢人的身體可以被拼湊起來，但是窮人的身體卻被切割得少東少西的、使得後遺症纏身一輩子；更重要的是大家還認為這是出自於窮人的自由意志、一切都是為了他們好。販賣器官於是變成了保險合約的一部份。另外一方面，新的「生命政治的世界公民」(bio-political citizen of the world)儼然浮現——白人，男性，胖的或是勻稱的，再加上印地安人的腎、或是穆斯林的眼睛。總之，腎臟繞著地球跑，並遵循著資本的流動路徑，從南到北，從窮人到富人，從黑人到白人，從女人到男人。女人也從來就很少接受器官移植。由此可知，這個世界化的年代，世界被分成一邊一國：賣器官的一國 vs 買器官的一國。



器官移植：世界化的象徵

這個世界化的年代某種程度上象徵著一種人人共享的世界，一個不再有外面、不再有出口、也不再有其他人的世界。不論我們如何聰明敏銳的批判北方的敘事、忽略了南方敘事，都必須承認：大家都住在一個彼此相互糾葛、矛盾複雜的「風險社會」中(Beck, 2009)。放棄那個人人自主、且能置身事外的夢想國度吧！也放棄那個清楚二分北方與南方的地理學種族主義了吧！

我所說的是北方理論，抑或南方理論？不，我說的，既屬於北方，也屬於南方。然後，用社會學的分析，系統性的把兩者的矛盾觀點結合，則正是「方法論世界主義」的精神。

至於新鮮的腎臟呢？他們是例外嗎？不是。世界化的過程影響且轉變了世界上的中介制度，像是家庭、家人、階級、工作環境、勞動市場、村落、城市、學校、科學、公民社會運動、一神論的宗教等等。它們存在於這個多中心的世界，伴隨著日益增加的移民特質，並侷限於民族國家的邊界裡面。世界化的過程也包括了氣候變遷、全

(文接第15頁)

(文接矢澤修次郎，第5頁)

多數的日本人不太和外國人溝通，而且對中國感到憤怒，特別在中國崛起之後更是如此。雖然看似合理，可是實際上這出自於日本人的自我優越感。

• 這會不會只是民族主義而已？

這比民族主義還多。日本人強烈地渴望回到一次大戰前那種以天皇為基礎傳統的文化系統。甚至有些自民黨的政治人物強調天皇系統的重要，認為若沒有天皇，那就不可能推行道德教育、社會整合、甚至社會進步…等等。這種想法深深地潛藏在日本人的潛意識裡。實際上，在面對全球化，日本人的家庭規範、群體規範、意識型態等所有建立在日本現代化基礎之上的制度都運作地不太順利。他們在全球化中迷失了方向。作為社會學家應該要為社會的未來提出一個新方向、新藍圖才是。

• 你好久以前就開始參加ISA了，對吧？

沒錯。我參加1982年墨西哥的大會，那時我受邀

出席全體會員場次。從那時候開始我就無役不與。日本和ISA有很特殊的淵源。Odaka教授是我再東大的指導教授之一，也是ISA的創始者。雖然他是一位自由派人士，但是政爭期間他很難表達意見。戰後他瞭解到國際關係的重要，於是到1960年代末其他都會參加ISA。在他之後Watanuki教授成為ISA的副會長，所以某個意義上我是Watanuki的後繼者。

• 從你30年前開始參加大會開始到現在，你覺得ISA有些什麼改變？

它一直在變。ISA有三大支柱，第一就是研究委員會；第二是國家學會的成員；第三則是個人會員。到1990年代中期研究委員會都還是ISA最主要的部分，而之後國家學會就越來越舉足輕重了。所以現在研究委員會和國家學會結合得很好。另外ISA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有能力和興趣去發展全球社會學的組織，所以，我們更應該建立起自己的組織智慧。 ■

(文接從世界主義到公共社會學)

的距離，有些人則關注在相似性上，關注年輕人、女性、或是母親等群體的共享經驗。實踐上，世界主義是一種協商，去協商一種差異與平等之間的妥協。這種協商不會一勞永逸，而會不斷繼續；這種協商不是平靜祥和的，而是充滿爭議、吵鬧、疲憊的過程。

讓我用我的城市Frankfurt來做為例子吧。去年，當準備要改變政策方向之際，Frankfurt負責族群整合的首長Nargess Eskandari-Grünberg採用一個關於族群整合和多元的新概念，並在網路上舉辦了上百場的激烈辯論，Frankfurt居民中能參與的都參與了。2010年10月底有47,000人參加。如此討論的目的在於要讓居民去思考：如何避免總是讓移民及其後代被社會孤立，以及如何更重視每一個人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不同需求。據我所知，這在德國是空前的創舉，政治人物也因為傾聽、承認、甚至挑戰居民的意見而受到許多人支持。

可是這發生在Frankfurt的例子，在德國也不是天天都在上演。德國央行(位於Frankfurt)的一位著名的理事Thilo Sarrazin出版了一本名為「德國要作自己」(Germany Does Itself In)，這在2010年的夏天引發了很大的爭議。Sarrazin在這本書中描繪了一個德意志民族(Volk)不復存在的未來德國，並宣稱福利制度的受惠

者和穆斯林是造成此結果的始作俑者。就像惡名昭彰的「鐘型曲線」(The Bell Curve)一書中把社會問題都歸咎給非裔美國人的基因一樣，Sarrazin把矛頭指向德國邊緣族群的基因。兩本書都用廣泛的統計資料、純科學的方法證實了部分的結論。

雖然Sarrazin的觀點不是什麼新鮮事了，但這本書所呈現的方式卻大大影響了德國人彼此溝通交流的氛圍。Sarrazin已經置身在辯論民族國家和在地相關議題的核心戰場之中。他的書銷售好幾百萬冊，是全國賣得最好的，而且全國的大街小巷，人人都在談論。媒體亦是宣傳這本書的要角。Sarrazin是位社會民主黨員，也是前Berlin的財政事務部長；他形容自己是一位受人愛戴的公共知識分子，認為自己敢說真話，不畏懼政治禁忌，不向政治正確屈服，不怕碰觸移民問題(特別是土耳其和阿拉伯的移民)。

在這場辯論中有一些未被言明的宣稱：

• 政治人物和政府距離人民太遙遠。政府的決策並沒有取得眾人的共識，也並不關心人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 德國社會在文化上是一個同質的群體，而威脅來自於伊斯蘭教。

• 移民不屬於德國，他們只是暫時的居民。他們的存在

(文接第8頁)

「多元普世主義」：新的典範？

Sari Hanafi,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執行委員

甫成立的「世界人文社會科學網」(World SSH Net)、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拉美及加勒比海國際教育機構(IESALC)、阿根廷科學委員會(CONICET)共同舉辦了一場為期3天的工作坊(2010年10月28-30日),地點在拉美社會科學院(FLACSO),主題是「社會科學和學術界中的文化——建立科學的多元普世主義(multi-versalism)所面對之認識論和教育的雙重挑戰」。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在Buenos Aires齊聚一堂,討論人們一方面越來越重視全球性的知識分享,另一方面現今的排他結構之下,許多的知識生產過程卻是一個黑盒子;那麼共享知識的需求將會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多元普世主義(multi-versalism)是相對於普世主義(universalism)的概念。它和南方那些相信普世主

義而默不作聲的學者相反,而是一種思考普世主義之限制的方法;不同於西方主義和東方主義的對立,多元普世主義尋求北方和南方學者之間的對話,以及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轉譯;它承認結構的依存性,但同時也試圖與之對抗。工作坊的與會學者都知道社會科學正在跟隨著國際化的潮流,所以很努力的想辦法如何讓這股國際化趨勢能更有文化的敏銳度,能承認知識其實原自於各樣不同的系統,例如,地方知識也是其一。

World SSH Net的會長Michael Kuhn在開幕演講中強調,我們必須以全球的多元詮釋觀點來取代歐洲的普世主義。他檢視了西方思想霸權中的本質與機制,然後提出了World SSH Net未來的工作重點,包括了:(1)掀開社會科學知識中的認識論預設;(2)檢視整合在具有政治意涵的分類與理論之

(文接第9頁)

(文接從世界主義到公共社會學,第7頁)

對於社會的團結和民族的認同來說,是個問題。

許多知識分子與政治人物都支持Sarrazin的觀點。這些人倒不一定支持他的生物基因論證,而是認為政治正確限制住了移民議題的討論,以及多元文化不過是那些造成問題的左派和移民(特別是穆斯林)的一相情願。這些人的看法為Sarrazin的書起了很大的宣傳作用。然而也有其他的知識分子與政治人物持反對意見。社會民主黨開始要把Sarrazin排除在政黨運作之外,要德國央行讓他提早退休進而退出理事會。不過更有知名的政治人物、女性主義者、科學家、藝術家支持批判伊斯蘭教。總之雖然各種不論支持還是反對的聲音都有,交錯複雜,可是大致上的氣氛還是憤怒的,而且情勢越來越緊張。極右派很明顯地從中獲利,而且整個辯論越來越難容得下理性思辨。那些挑戰Sarrazin的言論即使提供了很多研究證據來支持,但是在這場論戰中已經敗居下風。憤恨的情緒已經蔓延開來,就算魔法師來也難平息眾怒了。

那麼,這場關於多元文化的辯論有著什麼樣的意義?作為社會學家,我覺得這樣的辯論很有趣。我們可以從中找到許多研究問題,觀察政黨的作為,分析媒體報導,描述媒體之間的戰爭,或是把此事件的後續結果寫成文章或書。這也是在實踐韋伯所謂的社會學作為一門專業:將學術與政治分開,盡可能價值中立去描述社

會現象。然而,還有另一種社會學——曾經被稱為基進社會學,現在則稱為公共社會學,由下而上將公民社會和行動者連結在一起。Adonor和Frankfurt學派的其他成員可視為是這個傳統的先驅。從公共社會學的角度而言,我們要介入這場辯論,因為這場辯論已經把公開和有尊嚴的溝通扭曲了,而且某些特定的群體在其中變成了民粹動員的代罪羔羊。

因此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就是為那些沈默的人——那些不論是不是移民,那些在一起工作、學習、活動的人,那些是跨族群後代的人——創造一些空間,然後我們一起參與公共事務。若我們想保證人人都能相互尊重(學生也會更有競爭力)的話就必須這樣做。學生一定有受到這場辯論影響,所以我所懇求的無寧是這樣的一個計畫,或是一個對話:讓這個會影響到學生、老師、銀行家、政治人物、計程車司機等的辯論,可以以Adorno的問題:「如何無懼地與差異共處?」(“Wie kann man ohne Angst verschieden sein”)為核心出發點。這樣的努力或許很艱難,但絕非遙不可及的烏托邦;無論如何,我相信這將會消弭仇恨,邁向真正由下而上的世界主義。 ■

(文接多元普世主義，第8頁)

Chris Caswill (University of Oxford) 藉著檢視三個大陸來的三種不同聲音去理論化所謂的「社會科學實作與日常生活知識」：Charles Lindblom (美國)、Bent Flyvbjerg (歐洲，丹麥)、Catherine Odora Hoppers (南非)。每種意見都關心社會科學研究實作的內在關係、研究所生產的知識、知識的運用。

其他的參與者則提供了田野的研究個案：韓相震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提出了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 Beck 的「風險社會」概念如何在南韓的研究中以由下而上文化詮釋方式被實作。南韓所面臨的風險是來自於快速現代化導致的道德崩解，而在此一脈絡下，研究者必須關注儒家思想中的規範面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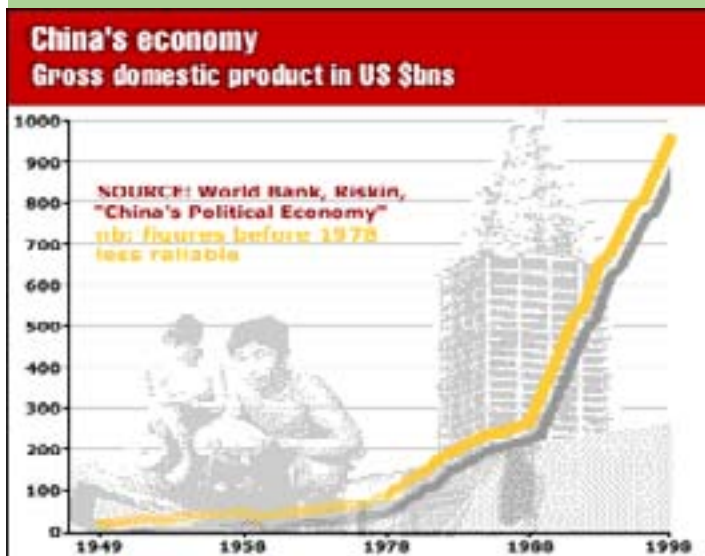
Nestor T. Castro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則認為菲律賓教育體系偏好西方的觀念，但是這些觀念對於菲律賓來說未必適用。舉例而言，教導學生要區辨「自我」與「他者」的不同，然而如此一來，要怎麼去描述菲律賓語中的「kapwa」這個字呢？此字意味著「在他者中的自我」(the self-in-the-other)，意即是互補的一對，例如，一種針對他者的團結。所以，他很強調社會科學教學中多元普世主義的重要性，因為社會科學中概念的來源相當多元；Kazumi Okamoto (Knowwhy Global Research) 也聚焦討論西方的社會科學霸權。他透過日本學者在與西方學者對話時所遭遇的困境(特別是當有學術上的歧義時)來說明此現象；Tania Pérez Bustos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柬普寨) 也同樣關心這個議題，指出科學與科技中共同預設的男性中心主義；Nese Karahasan (University of Ankara) 則探討過去20年來文化因素如何形塑了土耳其的社會學發展；I Ketut Ardhana (Udayana University, Bali) 為大家介紹印尼的文化研究；Carmen Bueno Castellanos (Universidad Iberoamericana Ciudad De México) 除了簡介墨西哥的社會人類學之外，還呼籲北方和南方不但在學術上要平等合作，在商業、國際組織、NGO 等的交流上也要如此。

會議上也討論了科學知識如何納入原住民的知識系統。Michael Christie (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澳洲) 說明了他的大學和原住民社會合作的經驗。多年來研究者(包括了原住民的共同研究者)致力於將數位科技和社區永續發展結合在一起，傳統知識的代間傳遞，以及傳統知識在大學教學和研究中的應用；同樣地，César Carrillo Trueba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向大家說明了墨西哥原

(文接第13頁)

中國社會學正面臨快速經濟發展的挑戰

李培林，中國社會學會會長



圖片說明：令人難以置信的中國經濟成長

中國社會學會2010年的年會主題是「中國道路與社會發展」，其具有高度的象徵意義。改革開放已經30年了，這段期間，中國歷經了政治動亂、經濟震盪、SARS、地震、全球金融危機等事件。雖然如此，中國還是保有高度的經濟成長和快速的發展，形成了所謂的「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經驗」。來自30個省和亞洲其他國家總計約600位的社會學家在哈爾濱參加這場年度盛會。除了大會主題之外，另外還有23個特別論壇。中國社會學社群不論在人數上或是在議題上都正在快速擴張當中。

最近的金融危機和歐洲政府巨額的財政赤字使得國際的發展日益複雜。一方面全球的經濟、社會、科技發展迅速，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往來與相互依賴也越益增加；另一方面人類也面臨了許多新的挑戰，例如資源分配、生態環境、不平衡的發展、區域衝突、金融安全。如何在這個複雜萬千且快速變動的環境中維持和諧和持續發展，以及如何確保國際社會的秩序與穩定，的確是我們這個時代重要且真實的課題。

我國的經濟發展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邁入了嶄新的階段。發展的模式改變、城鄉差距的削減、區

(文接第10頁)

(文接中國社會學正面臨快速經濟發展的挑戰)

域發展的協調、加速的社會建設等議題是此新階段的重點。中國現在正在執行第12個5年計劃。下個5年將會是發展的重要階段，也將帶領中國在2020年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

改革開放30年也讓中國社會學邁入了史無前例的發展階段。過去30年來快速的經濟成長和社會結構的轉型提供了中國社會學發展肥沃的土壤。此外，中國社會學也幫助中國建立了和諧的社會。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之中，社會學家謹慎地觀察並分析社會現象，針對社會問題提出解答，持續累積學術知識，並建立社會學在社會科學中的重要性。

快速的經濟成長也使各種問題層出不窮，譬如資源浪費、生態破壞、貧富不均、地方債臺高築。許多中國社會中的現象並無改善，像是公共教育、勞

工保障、社會福利、醫療保險、協調的城鄉差距。這些年來我們看到了許多校園和幼稚園的社會報復性殺人喋血事件、工人罷工、工人自殺等。社會學家應該多注意這類問題才是。

因為我國的快速成長使的中國社會學在國際間日受重視。我們和美國、法國、俄國、印度、巴西、日本、韓國建立了合作關係，也開始發揮國際影響力。

各位學者，中國擁有絕佳的機會，也將面對未來10年的大轉變。我希望你們可以一起加入，掌握這個機會，一同研究與改革發展有關的議題，幫助年輕學者成長，進行社會調查，為社會學的歷史留下更多更好作品。現在，我在這裡宣布：中國社會學會正式對外開放！ ■

聯合國與組織犯罪

Rudolf Richter, University of Vienna



偷渡

作為一位觀察員，我參加了第五屆「聯合國對抗跨國性組織犯罪公約」之締約國會議。會議在2010年10月18-22日於奧地利維也納舉行，目的在於提供平台，讓締約國報告打擊跨國性組織犯罪的執行狀況。

從經濟角度而言，跨國組織犯罪肇因於大量的金錢流通。在一場簡介演講上，講者說每秒非法交易的金額是20萬美金，因此，有一點很重要的是，對於此事世界各國立即展開辯論。會議之後各國達成了普遍的協議，強調跨國合作的重要性。其中之一便是阻止利用銀行帳戶的犯罪行為。

此外，個別的議程包括了：審查各國對抗跨國犯罪的成國；關於人口販運的協議；關於走私與偷渡的協議；關於軍火的協議。

整幅圖像相當分歧複雜。例如，非法交易可能也有好的一面，像是協助難民逃難、幫助移民獲得更好的生活。更進一步，也有人認為類似的交易應該合法化。對於罪犯來說，偷渡是個高報酬、低風險的買賣，但國際社群試圖要把這類交易的風險增加。相反地，軍火交易絕對是負面的。此外，新型態的犯罪，例如網路犯罪或是器官買賣等也必須列入條約中。

全體出席的場次中討論了組織犯罪的評估，這個部分受到獲選會員的監督和充分的資料佐證。有些國家匆忙地執行評估工作以呈現其工作成果；有些國家並不積極實行、擔心成本問題。因此，資金是個問題，北方國家應該給南方提供援助。

與會眾人皆同意要蒐集資料，並藉助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裡專家使用的工具，然後分享彼此的經驗(比只是給建議好)。新的NGO已經可以參加，他們將不再只是觀察員，這點強調了公民社會的重要。另外他們提供一種以受害者為中心的方法，去建立一套提供補償、援助、自主結社的標。

對社會學家來說重要的議題是資料的收集，而社會學家可以協助蒐集到質化或量化的資料。量化研究可以藉由透過增加國家或個人的個案而臻至齊全。此外，社會學家也可以和公民社會的組織合作，協助訓練律師或行政人員。

對於這項議題有興趣的人請參考：<http://www.unodc.org/unodc>；欲提供意見者請前往：<http://www.unodc.org/unodc/en/ngos/news.html>。 ■

社會學和環境變遷：馬來西亞報告 Ruchira Ganguly Scrase，亞太社會學會會長

2010年12月在馬來西亞的Kota Kinabalu舉行了第10屆亞太社會學(APSA)年會，由University of Malaysia, Sabah (USM) 和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UOW)協辦。大會主題是「社會與環境變遷：亞太的機會與挑戰」，並吸引了大批的平面和電子媒體的大幅報導。社會學家向來沒有偉大的公共形象，但是這次有些學者接受了訪問，讓我們有機會可以讓全世界瞭解我們學院以外的面貌。

主題演講者是Datuk Dr. Shamsul Amri Baharuddin教授 (Founding Director,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ISA executive member Emma Porio教授(ISA executive member, Professor of Sociolog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Chris Chong Chan Fui (在Sabahan出生的電影導演和視覺藝術家)。Porio教授的演講主題：「社會與環境變遷：社會學與社會學實踐的機會與挑戰」激起了很熱烈的回應與討論。過去雖然也有知名電影導演或記者參加APSA，但是這屆還是頭一遭放映得過獎的年輕導演所拍攝之紀錄片。導演Chris的紀錄片「Dislocation」獲得了與會人員的多數好評，促使我們開始構思把紀錄片放映納入正規議程，況且有越來越多學生和年輕的研究者對於媒體社會學產生興趣。

來自15個國家、約150名社會學家與會。而且很令

人振奮的是有來自歐洲、研究亞太議題的學者來參加；與會者也包括了很多學生，他們提出了新穎的觀點與挑戰主流的社會思想。

私底下與大會代表言談中得知這次大會相當成功，每一位參加者都覺得賓至如歸。

在APSA AGM的部分，前任研究生代表Nichole Georgieau剛送出博士申請；而Briekena Qafa-Osmani則是新的代表，一位阿爾巴尼亞人，是馬來西亞International Islamic University的社會與人類學博士候選人。除此之外，秘書



ISA執行委員Emma Porio在APSA年會演講

處無其他人事異動。

APSA的傳統重頭戲是大會晚宴。當地的Kadazan舞者為與會帶來很精彩的表演，特別是Scott Baum教授(APSA的秘書長)，他讓我們見識到了他高超的舞技。總之大會相當成功，人人盡興。下次的年會已經開始籌畫，時間與地點則尚待公布。 ■

澳洲社會學年會快訊

Dan Woodma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0年12月6-9日澳洲社會學會(TASA)在雪梨的Macquarie University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大會，由「社會學益智問答」(sociology trivia night)開場，如此一來大家對於TASA的秘辛都有更深的

瞭解(爾後在ISA的場合上遇到澳洲學者時談話可得要注意啦)。我的團隊(幾乎由TASA的Sociology of Youth Thematic Group組成)得到第二名。大家都知道第二是

最理想的名次，而也由於澳洲重視平等的優良傳統，第二名跟第一一樣可以領到獎品—四瓶白酒！

開幕主題演講由Syed Farid Alatas擔綱。Alatas教授的主題以近期TASA的會議中圍繞在Raewyn Connell教授對於「南方社會學」呼籲的爭辯為主，進一步闡述非西方的理論如何和西方的「經典」作品對話。第二場的主題演講中，Mary Holmes討論了當代主體中情感(emotions)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人們如何可能反身性地利用情感去形塑其日常生活。最後一場演講，Raewyn Connell、Jack Barbalet、Michael Gilding三人共同質問：「新自由主義的概念已經山窮水盡了嗎？」他們認為，把什麼現象都歸因於新自由主義，會使得社會學變得很懶惰；況且新自由主義也未必能精確捕捉當代資本主義運作的內涵。然而討論的結果是大家都同意若社會學家過去覺得這概念不恰當，那麼當初就應該發明新的。



博士生Justin Lu從TASA會長Michael Gilding手中獲頒獎項

其他的場次也很精彩。我參加了以Sociology of Youth stream這個大主題為主的討論，其場次多到快滿出來了，並且其中的辯論既溫和又激烈。同時段的場次也是一樣的情形，每場都

一位難求，甚至可以看到遲到的長者還必須站在會場門口的情況。有些人還開玩笑說，沒有座位的教授們應該盡可能地裝老裝弱，好讓那些年輕人讓位給他們。

可是我的印象裡面好像關於澳洲社會學之當代或是未來的危機(crisis)相關議題，著墨並不多。發表人似乎對於近年來澳洲社會學所做出的貢獻都抱持著很正面的態度。會如此地樂觀，可能是因為大家多了一份自信——在澳洲的公共領域中社會學家的發

言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但也越來越被重視；也可能是因為有些社會學系所錄用了新人、擴大了規模；也可能只是因為我們的經濟情況似乎沒那麼糟吧(和那些遠渡重洋來參加會議的英國學者比起來)。

最後，雖然校園裡的酒吧都在放暑假沒開，整個年會的氣氛依然非常融洽，許多的討論都從早持續到晚，適合社交的場所就在附近，店家每年也都會被告知會有大概15人左右的社會學者(一群溫和、半夜3點就會被護送出或是攆出酒吧的教授)去消費。我的同事Ani Wierenga建議明年的年會應該頒一個獎給分析類似「保鏢一學者」經驗的論文(甚至是回憶錄)！明年大會將在11月底於University of Newcastle舉行，主題是「在地生活/全球連結」(Local Lives/ Global Networks)。Newcastle位於距離雪梨2小時車程的海岸線，旅遊聖經Lonely Planet稱之為2011必看的城市之一。各位同事們，若資源條件允許的話，明年肯定是來參加TASA年會的好時機！ ■

Scientific Circles：波蘭年輕社會學家的計畫

Tomasz Kukolowicz, University of Warsaw、Lukasz Srokowski, University of Wroclaw

Scientific Circles是波蘭社會學會(PSA)的一個小組，參與者約有來自15個大學的100名學生。其命名的靈感來自於波蘭很受歡迎的一種結社形式：scientific circles。這些組織所訴求的是學生的學習要超越學校的必修課範圍，而典型的類似活動包括了：舉辦科學類的會議、討論、與「有趣的」人座談、執行小型研究案、或是偶爾出版雜誌書籍。這些活動得到的資金贊助並不多，有時甚至沒有贊助。

PSA的Scientific Circles小組在2004年由一群碩士與博士生成立，其理念是希望可以結合來自國內不同城市的年輕社會學家，共同組成一個論壇，彼此交流切磋。PSA(特別是前任會長Włodzimierz Wesolowski教授)向來很歡迎並幫助學生舉辦活動。隨著越來越多人參加這個小

ISA連到了誰？社會學家與全球數位落差

Jennifer Schradi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卡片目錄、打字機、微縮膠片…等等，這些都是曾經是學術領域的重要科技。如今，社會學家多半依賴Jstor、筆電、EndNote。然而，大家知道南方的(global south)社會學者使用什麼科技嗎？

在1990年代關注數位落差議題的時候，學者感興趣的是檢視上網與沒有上網的人之間的數位差距。但是日新月異的科技使用激發出了相關的議題，例如數位活動的階層化、技術水準的差異、科技資源等等。有些學者(如Ono and Zavodny 2006)比較不同國家的上網率，可是鮮少討論在不同政治經濟背景下不同國家的數位差異為何。例如，對於ISA來說，數位不平等可能會影響到溝通的方式：網路上的合作可能不能解決那些來自於資源較為貧乏地區的社會學家無法參加國際會議的現實問題。

我們試著解讀下列的資料來指出ISA的會員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挑戰。首先，ISA把會員分為A、B、C三種。美國和英國是擁有最多會員數的國家，他們在2008年的平均上網率是76%。同時A類的國家，雖然我們無法取得資料，但是可以推論他們也同樣有很高的上網率。另一方面，C類的國家，如印度和奈及利亞，上網率分別只有5%和6%。

但是，不管國家的上網率為何，都不能代表社會學家的上網率，更不能解釋他們上網都在做什麼。舉例而言，一位奈及利亞的社會學家可能具備基本上網功能的電腦，可是他的學生卻沒有；或是要花大把前買設備；或是沒有最新的軟體去跑分析或寫論文(Endnote、Stata、AtlasTi)；也可能看不到Jstor等線上資料庫。

華盛頓大學的社會學家Philip Howard稱這種現象叫做知識落差(intellectual divide)。在The Digit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2010)這本書中他研究世界各地的伊斯蘭國家，發現在發展程度較少的國家中，學術受惠於國家制度的領導人。在這些國家中，最先進快速的電腦社會都位於主要大學的圖書館中。但這取決於大學或圖書館如何分配、利用這些資源。這意味著能夠提供國家最多幫助的

大學就會得到較多的資源。結果就造成了學科不平等。社會科學總是處於最低的位階，所以也就不能使用各式各樣的期刊。縱使社會科學已經有那麼多期刊，然而工程和公共健康類始終有使用的優先權。因此，有些社會學家並無法閱讀到期刊。

什麼樣的數位障礙是你或是你的學生所面臨的？ISA現在對於這樣的議題很有興趣。若有任何問題請聯絡我：Jen Schradie, schradie@berkeley.edu 並附上你的國家、職位、以及學術單位。

References

Ono, H., Zavodny, M. 2007. Digital inequality: A five country comparison using microdat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ume 36, Issue 3, September, Pages 1135-1155.

Howard, P. 2010. *The Digit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litical Isl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美國	英國	巴西	南非	印度	奈及利亞
上網率	76%	76%	38%	9%	5%	16%
ISA 經濟體分類	A	A	B	B	C	C
ISA會員數	704	289	176	157	249	134

(文接多元普世主義，第9頁)

內的社會模型；(3)發展出一種全球視野的方法論，將社會科學從那些政治性的特殊主義中解放出來。

工作坊的討論沒有打高空，而是研究具體的經驗個案。因此，Hebe Vessuri (Venezuelan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Research)建議大家的討論觀點從「科學的文化」轉向「研究的文化」。依Bruno Latour的觀點來看，科學是冷靜、中立、抽離的，而研究是溫和、介入、冒險的；科學試圖結束人類的爭端，研究則開創各種爭議。此外，科學為了追求客觀，努力嘗試要避開意識型態、熱忱、與情感的枷鎖；但對於Vessuri來說，研究和社會已經彼此糾結纏繞，密不可分，而且，社會科學研究本身也是在經驗這個社會中某些有趣的變遷。對話、比較、轉譯，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標語。

與會者也都同意承認人類經驗多元性的重要性。

(文接第16頁)

(文接Scientific Circles第12頁)

組以及有越來越多的新計畫，Scientific Circles在PSA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這個小組在過去3年來最大的計畫是「移動工作坊」(Moving Workshops)，目前為止定期舉辦6個會議，並有125位學生、25位年輕學者的參與。這個計畫的基礎是大家都觀察到一個現象：從學科角度而言，每所大學的社會學都不盡相同。這個工作坊為期2天，來自各地15至30位的學生齊聚一堂，共同學習。其一的Scientific Circle負責組成會議並邀請其所屬大學的學者，然後把討論聚焦在一個主題上，涵蓋理論的介紹和實際的研究操作，然後通常會執行一個微型的研究，由學生收集經驗資料，之後與教授們討論並進行分析。

我個人覺得這個工作坊最有趣的一次是2009年3月在Poznan的主辦的那次。這場的主題是日常生活社會學以及物質文化。在開幕演講中簡短介紹了Poznan的社會學歷史，認識到了Poznan University第一位的社會學教授：Florian Znaniecki，也瞭解了該大學戰後的歷史。理論的部分則包括兩場演講：



PSA會議中的社會學生力軍

Rafal Drozdowski教授說明了為什麼日常生活社會學現在除此熱門的9個原因；Marek Krajewski教授則介紹以物對象的研究，認為人和物的關係是對稱的。值得一提的是兩位講者都是該領域的佼佼者。至於實作的部分，學生則以4人為一組分別去作田野，搜尋常見與罕見的事物。他們使用小型相機和錄音器材走遍Poznan的各個地區，然後回到Poznan University報告結果。討論之後發現，某些事物之所以被歸類為不常見的，是取決於人們對於情境的社會性定義。

Scientific Circles帶給PSA一項額外的副產品：年輕社會學領導者學校。此計畫想要養成年輕學者關於組織管理、溝通、協調的能力，每年訓練4到5週，並在不同的城市實習。如此一來年輕學者就可以彼此見到面，進行交流。雖然這個計畫並非正式屬於PSA之下，但是幾乎從這裡結業的100為學生之後都參與PSA的Scientific Circles，並相當熱心的投入參與，貢獻所學。 ■

Scientific Circles帶給PSA一項額外的副產品：年輕社會學領導者學校。此計畫想要養成年輕學者關於組織管理、溝通、協調的能力，每年訓練4到5週，並在不同的城市實習。如此一來年輕學者就可以彼此見到面，進行交流。雖然這個計畫並非正式屬於PSA之下，但是幾乎從這裡結業的100為學生之後都參與PSA的Scientific Circles，並相當熱心的投入參與，貢獻所學。 ■

速寫哥倫比亞的社會學 Ana Lucia Paz Rueda, Icesi University

在哥倫比亞有15個社會系所，其中6個在私立學校，9個在公立學校。1959年社會學剛誕生，特別關注農村、政治、社會變遷、與國家。幾十年下來也開始關注都市、工業、文化等議題。為了分析民族暴力與社會分裂的問題，哥倫比亞的社會學也開始需要新的方法，包括「參與行動研究」。1969年的一場政治危機導致了社會學「大理論」(grand theories)的鞏固。

1990年，隨著新的社會學系所的設立，這門學科重新誕生了。接下來的15年，社會學系所從5間增加到15間。多數都在人文與社會學院內，這間接鼓勵了跨學科的交流。這些系所之中，60%是需要修業10學期的，40%需要8學期，平均需要155個學分。將近半數的系所強調實踐與社會參與。專業化則是圍繞在社會轉型與分析、解答哥倫比亞的社會問題之上展開的。

哥倫比亞也有22所的研究中心有包括社會學領域，其中大約75%附屬於公立大學。社會學的訓

練著重在方法論(25%)、跨領域(25%)、社會議題(18%)、理論(15%)。方法論課程質化與量化並重。未來將會有越來越多的管理與社會政策的課。理論課特別把重心放在馬克思、韋伯、涂爾幹(15所之中已有9所開授)。

上述簡短的介绍顯示出了哥倫比亞社會學歷經了長期的變化，並且正面臨挑戰。越來越多的學術單位採用社會學的分析框架從事研究，代表了其成長的潛力。此外也至少有3個領域尚待加強：(1)國家性的公共議題辯論：經濟、正義、公共文化的建立；(2)對於那些可以捕捉到新的社會脈動之系統性視野，要特別關注；(3)思索如何才能夠碰觸到人們的實際生活。我們也必須發展出一種能夠讓不只是社會學同儕能夠瞭解，還要讓立法者、社會行動者也能讀得到的溝通對話模式。換句話說，我們需要能夠想像並接合這些人的學者——一位不論在理論與實踐上都能夠直覺地辨認這些人、並邀請他們加入對話的社會學家。 ■

(文接新鮮的腎，第6頁)

球金融海嘯等。例如，被全球化的全球家庭(global families)同時體現了似乎合理的悖論：遠距離的親近和全球性的矛盾。並非所有的家庭都體現了所有的矛盾現象，但是某些家庭倒是體現了其中的一部份。就像移民家庭裡常會出現中心與邊陲的緊張矛盾一樣，那些來自兩個國家的婚姻、父母、情侶等可能體現了兩個國家的緊張，或是主流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矛盾。我們可以用全球家庭和遠距離親密來思考去重新思考傳統智慧，以及發展一個強而有力的論述：遠距離的愛及其矛盾；這也反映出了一種國家精心策劃並載明於法律中的無知狀態；我們進一步可以知道遠距離的愛和全球家庭變成了這樣的一種情況：在這之中，文化創傷——一種對於歷史上帝國主義所造成的全球不平等至今仍然揮之不去的忿忿不平——始終存在且會持續下去。

此外，母職也在全球化。醫療化的生產過程為我們帶來了一個美麗新世界：捐卵者，或是代理孕母；(讓我們帶入公式)「我媽是一位西班牙的捐卵者」或是「我媽是印地安的代理孕母」；再一次我們看到生物科技操縱的全球不平等鑲嵌進了人類的身體與認同裡。

難道這不是一種全球化的論述？難道這不是新版本的舊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就像Stuart Hall的經典名句：「我們只是英國人喝茶時所加的糖罷了。」連續性和差異性一直都在，等待著我們去釐清與承認。全球化的觀念必須摒除在那些全球化論述中司空見慣的「空間偏見」，並且要對於當今文化創傷的歷史源頭有所察覺。但後者，也是一種當下對於未來的期待，一種反身的現代性，因為，結合了通訊與醫療科技的全球資本主義已經取得勝利，侵蝕了不論是北方還是南方國家的制度與二元性，像是國家／國際、我們／他們／、核心／邊陲。我們甚至將會親眼目睹全球化的基進轉向。前核心(ex-centric)的國家不是正在被「前—後殖民的」(ex-post-colonized)、發展中的國家(特別是印度、中國)預先殖民(pre-colonized)嗎？如今，中國正在插手歐洲事務，宣稱要防止歐洲危機的同時也在保護自己的投資佈局；中國在擁抱歐洲的同時，也在保護自己。這，也是世界化。

所以有一件事情是毫無疑問的：不論古典社會學是否發曾經發展出方法論世界主義的概念，當代盛行的方法論國族主義遮蔽了北方和南方的社會學，無視於這個年代正在世界化的事實。

為什麼會這樣？這種國族主義的凝視：領土，護照，認同，是一種世俗版本的三位一體。所以國族

主義觀點下的社會不平等是顛倒過來的，其對不平等的關懷止於國家邊界；沒錯，社會不平等是很嚴重，但那都是其他國家的情形；它最多激起我們內心裡一時的憤怒，但政治上可以毫無作為。

國家邊界在我們和他們之間畫出了一條徑渭分明的線，政治上彼此無關，不平等也彼此不相干。合法的制度性力量依賴於國內社會的不平等，而國家間的不平等則不見蹤影。全球不平等的合法化奠基在一個制度性的他者觀點。例如，生活在歐洲，國族主義凝視可以完全無視於全球其他人的苦難。這樣的運作是一種雙重的排除過程：排除那些已經被排除的。這確實讓人驚訝！全球不平等被牢固地合法化了；這個合法性建立在在民族國家之間對於不平等的默示同意上，也建立在民族國家的社會學——一種價值無涉的社會學——之上。

Raewyn Connell說：「想要打破歐洲中心主義思想的方法就是去研究其他非歐洲的思想。」這我不同意。為了掌握構成當今世界的現代性拼圖，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可以整合「後南方」與「後北方」的理論框架。這不是說要去找尋一個不知道從哪來的上帝之眼，而是，不論它是在法國、澳洲、日本、印度、南非、或任何其他地方，要去為日常生活周遭的社會學問題找出實際的解答：要怎麼研究這個已經被全球化的複雜世界？

話說回來，這就是世界主義社會學的全貌了嗎？至於批判和目標呢？不完全的世界化是否會導致維持現狀、為全球治理性背書呢？或是世界主義社會學可以激發出批判的能量？可不可以變成一種批判、自我反身的世界主義(複數!)？答案是肯定的，絕對可以。不過這又是另外的主題了。

Raewyn，謝謝妳的書單。 ■

全球連結計畫：把社會學和社會運動者串連起來

Ana Lucia Paz Rueda, Icesi University

「Interface: A Journal for and about Social Movements」是一份開放的多國語言期刊，目的是試圖在運動者和學院之間搭起一座國際對話的橋樑，並跨越語言、文化、意識型態的隔閡，超越運動和學科之間的藩籬。這樣的創舉是由一些學者和社運人士發起的，因為他們發現既有的社會運動相關的期刊試圖透過以下兩種方式和他們所研究的對

(文接第16頁)

(文接全球連結計畫)

象保持一定的距離：第一，學者理論的關懷對於研究對象(社會運動)而言並不總是那麼有用，也不是那麼相同。同時，社運也在生產知識，透過網站或其他媒體得以傳播開來，並且通常聚焦在很特定的議題上，然而這些對於不同政治文化脈絡下的其他運動而言，並不適用。Interface的編輯想把這兩個知識生產來源結合在一起，跨越現有的全球對話鴻溝(請見Flesher Fominaya, Issue 1)。

我們之前就在構想一個群體編輯的組織——一個可以反映出我們全球性期待的結構。因此這也醞釀了2年的時間來完成。我們除了是想像上的共同體之外，其中的幾位仍是素未謀面，而且我們也沒有金錢資助的來源。這份期刊的編輯方式有兩大特色：其一，是一個去中心化的集體編輯組織，在每個地區有半自主性的一組人，包括1到3位的編輯。這些分散各地的代表群體會負責當地的稿件業務，並且我們期待與投稿人的工作關係是相互理解與支持的模式。其二，我們的同儕審查是非一般性的，意即我們同時從運動和學術這兩個角度去審查文章。理論上這應該分別由一位運動者與一位學者來審，但是實際上這兩個角度的意見來



Interface 第一期
(Elizabeth Humphrys攝)

自同一個人，因為我們要求審稿人要同時提供實踐與學術的審查意見。我們努力地想要照顧到這兩類讀者，並超越特殊的運動或議題的狹隘疆界。每一期的主題由主編的特定關懷而定，而每一位編輯輪流當主編，負責規劃當期內容。

2009年我們初試啼聲，發表了一系列關於社運知識、公民社會與運動、危機與革命、運動與另類媒體等議題的文章。最新一期的內容將會包括鎮壓與社會，以及女性主義運動。此外我們也歡迎所有非主題性的文章來投稿。截至目前為主已經有一般性文章、運動者訪談、主編的話、行動筆記、關鍵記錄、辯論、書評、文獻回顧等形式，並且以6種語言發表。作者來自於世界各地，包括了安哥拉、阿根廷、奧地利、巴西、英國、加拿大、德國、希臘、匈牙利、愛爾蘭、拉脫維亞、墨西哥、挪威、巴勒斯坦、葡萄牙、俄國、南非、南韓、西班牙、瑞典、泰國、美國、委內瑞拉。從2010年3月起我們開始有網站了，有130個國家的讀者曾經造訪過。歡迎所有人的蒞臨：www.interfacejournal.net ■

(文接多元普世主義，第13頁)

住民農業和藥物之間有趣的關係。

Foucault的知識/權力觀點也沒有在此次會議中缺席。我指出了中東大學系統與在地知識生產系統如何形塑了菁英；在中東，大學總是把把菁英分為兩種，一種是在國際社群很活躍、卻在當地默默無聞的菁英，另一種是在當地很活躍、卻在國際上沒沒無名菁英。我認為，為了連結地方與世界，對話和文化之間的轉譯扮演著重要角色：透過和國際學者對話使自己的理論有普遍性；透過與在地學者對話使自己的研究有相關性。Pablo Kreimer (Quilmes National University, 阿根廷)也闡釋了類似的全球一地方的困境。他以拉美的STS研究為例，在「邊陲但全球化」的城市裡，鑲嵌在國際場域中的科學文化和地方知識總存在著緊張關係；在宣稱中立的實驗室裡和公民社會中的行動者中，也是如此：人們可以對科學的結果和影響產生懷疑，但卻不容許對科學的認識論預設提出質疑。

Cláudio Costa Pinheiro (Th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istory, Rio de Janeiro)用兩個很生動的例子來說明知識/權力的複雜糾葛。第一個例子是法國人口學家Alfred Sauvy的概念：「第三世界」。這個概念是在1951年巴西首先被發明出來，並發表在巴西知名的期刊上，然而卻在法國的著名雜誌Observateur上出現後才成為普世皆曉的用語。它原本的意義反映了北方(理論發明者)和南方(理論消費者)的分裂，但如今此意已經不復存在了。第二個例子是依賴理論。此理論可以從巴西擴散到全世界，然而，對於北方來說這個強而有力的智識運動卻是一種意識型態。

總之，這場會議很精彩，也很刺激，所辯論的議題都是ISA所提出的全球社會學中的核心關懷。我們很願意繼續把它做好，並注意鄰近學科的相關討論。 ■